

刘刚 著
李冬君

传统书院和民间海权
——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两条起跑线



通往立宪之路

告别晚清的近代史

【下册】

71. 救灾背后的政治文化

光绪小皇帝，有点像哈姆雷特王子，是个悲剧性人物。

亲政伊始，他的父亲奕譞就病人膏肓，不久便呜呼哀哉。

婚礼之后，接着就办丧事，婚礼是政治，丧事也是政治。先要定称号，根据“父为士，子为大夫，葬以士，祭以大夫”的古义，求“尊亲两全”，乃定称号曰“皇帝本生考”。接着定祀典，新赐邸第，建醇贤亲王庙。《清史稿》“礼志五吉礼五醇贤亲王条”云：“祀仪、乐舞、祭器、祭品视天子礼”，规定“凡时飧以四仲月朔，袭王承祭。帝亲行，则袭王陪祀。诞辰、忌日，帝亲诣行礼”。

祸不单行，天人感应，直隶地区大雨狂风，通宵达旦，足足一星期，山水奔腾而下，漫溢永定河、南北运河、大清河，溃决堤防，百里之地，一片汪洋。接着又阴雨连绵，旬月不已，京畿一带，水势盛涨，右安门、永定门外数十村庄被淹，房山之水，冲入浑河，东安、武清、良乡、涿州等地，水深数尺，路断行人，灾民嗷嗷待哺，正是“水近高楼伤帝心，万方多难此登临”。

清廷命顺天府尹潘祖荫，酌拨银两，雇募民船，速往救济。

又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于天津就地征粮，速运京师，平抑京师粮价。

然而天津，处九河下梢，地势低洼，号称“七十二沽”，是个浮在水面的城市，九条大河在天津汇流入海，只要降雨量一大，河水必在天津泛滥成灾。据当时《严修日记》记载，天津连日下雨，他家“居室十余楹，漏痕殆遍，春日读书之庐，变为沮洳矣”，故“忧心皇皇，如濒大难”。

奉太后懿旨，朝廷发内帑银五万两赈灾，于是，群臣都要上朝去感恩。感恩，是一种政治文化，群臣山呼万岁，以谢圣恩，慈禧老太太自然是风声、雨声、谢恩声，声声入耳。

可是，她没想到还有另一种声音，格外刺耳，令她恼羞成怒。

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御史吴兆泰，竟敢冒大不韪，跳将出来上奏折，说什么“畿辅奇灾，嗷鸿遍野，僵仆载涂，此正朝廷减膳彻乐之时，非土木兴作之日”，还“乞罢园工”，要她停修颐和园“以慰民望”，还将列祖列宗搬出来，要她效法。还在同治帝亲政时，她就想修圆明园，那时就有言官上疏劝阻，或曰：“使自来为人君者日脍削其民而无他患，则唐宋元明将至今存，大清何以有天下乎？”

后来，她将这笔账算到奕訢头上。光绪四年，畿辅旱，言官何金寿以“汉代天灾策免三公”为言，请罢枢臣，以回天意。此折一上，越日，命下，恭亲王奕訢等五人并褫职留任。

而这一回的水灾，居然把账算到太后头上了，到此为止，倒还罢了。不久前，紫禁城贞度门失火，延烧太和门及库房等处，太后以“遇灾知儆，修省宜先”，将颐和园工程，除佛宇及正路殿座外，其余都停了。可这一次，这位吴御史多说了几嘴，竟然说到海防了，这就触到了她的隐私。

本来修园子的费用，号称“悉出节省羨余，未动司农正款，亦属无伤国计”。可事实上，工程款动用了海军军费，伤了当时最大的“国计”——海防。颐和园工程，由海军衙门来“承修”，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？每一项工程，都由海军衙门包给商人，完工后，由海军衙门派员验收，然后移交颐和园管理大臣。修建经费，也由海军衙门“筹划”，不仅每年从海军经费中腾挪三十万两，拨给颐和园工程处，而且奕訢、李鸿章还以“备海军要需”的名义，由各省总督、巡抚认筹白银二百六十万两，于四年内分批解存天津生息，所得息银，全部用于颐和园工程建设。光绪十五年，朝廷开办海防新捐，“以常年通计，每年约收银一百七八十万两”，当颐和园工程需款时，“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”。

因有此隐情，故吴御史奏请“节省颐和园工程”，一提起海防，慈禧就急，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，对吴进行严厉斥斥，斥其“冒昧已极”，“著交部严加议处”。“议处”的结果是，将吴打入死牢，亏了他老师张之洞联络各省督抚联名救他，使其免于死，但永不叙用，真

的变成“无御史”了。

吴御史触逆鳞，险遭灭顶，杜门谢客，戚友莫至。一日，有人来见，门者却之。固请，吴乃出见，不数语，便问朝廷如何处分你，吴言不敢知；问负债，吴答八百金。来者言，近日言官皆失语，唯君能直言，然揣上意，阁下恐必丢官，知君清苦，故为备资斧。吴愕然不敢受，来人道，此为公义，君不必固辞，且不应辞。因探怀，出六百金票相赠，第二天，又送四百金至，说还债外，可更以此为归田计。吴归故里，从此告别朝廷，永不为官，以持异论者讲宪政于书院，此真乃靠朝廷难以安身，入书院可以立命。

本来老太太花几万银子，打发一下灾民，虽然杯水车薪，也算是聊表寸心。可这吴御史却当真，竟得寸进尺，要停了老太太修园子，不教训一下怎么行！灾民遍野，又不是老太太一个人的事，不光是老太太在修园子，内阁学士张之万寿辰，京官们不也在福寿堂演戏公祝，弹冠相庆？

李鸿章因水灾严重，赈款难筹，请推广赈捐，下部议行。赈捐一行，各地赈银便陆续汇来。先是两江总督曾国荃电汇赈银九万两，汇给天津六万两，顺天三万两；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汇天津、顺天赈银各一万两；安徽巡抚沈秉成筹解顺天、直隶赈银各二万两。清廷风闻待赈款实放，仅有发银七百抑或银二百，便命李鸿章严查侵冒克扣，立时惩办。又命户部拨部库及海关银三十万两，济永定河工。

水势渐渐平息，灾情慢慢缓解，流民安顿下来，一切又回到了原样，洪水没有带来思想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认为中国文化是自私的，应以基督教文化取而代之。国难当头，光绪帝为父修庙，虽然是祖制，但这制度的原则却是自私；老太太要修园子，当然就更是不折不扣的自私了。这还是登上了档次的自私，至于那些如蛆虫般蠕动的阴沟里见不得人的自私，就更是数不胜数防不胜防了。制度化的自私，如皇帝为祖宗修庙，那是要提倡的；权威性的自私，如老太太修园子，可以问一问，但问者多半要倒霉。至于那种鸡鸣狗盗的自私，如贪污中饱，克扣赈银等，则不妨揪出一两个来，杀鸡吓猴。

中国政治文化的奥妙是“窃国者侯，窃钩者诛”，上了规模与档

次，强盗也能当皇帝。“窃国者”要诛“窃钩者”，对于像马铃薯一样自私的民众，则不妨用一个“大公无私”的袋子将他们都装进来，比如，让自私的民众自愿来救灾是不行的，可是用一个“赈捐”的袋子就把他们都装进来了。

儿皇帝也很忙，丧事要办，水灾要救，外交要管，洋务当然也不能停。据《清史稿》“礼志十宾礼外国公使觐见条”载，驻英使臣薛福成奏请“宜循同治十二年成案”，接见各国驻京公使，“若论礼节，可于召见先敕下所司，中礼西礼，假以便宜。如是，彼虽行西礼，仍于体制无损”。光绪帝接受建议，“自是遂为定例”。詹事府詹事志锐奏请出使美、俄、英、法、德五国大臣，每届酌带同文馆学生两名出洋，专习语言，方便之事，何乐不为？于是，光绪帝又准了。中兴名将曾国荃、彭玉麟等先后凋零，中兴时代也随之而去，留下一个李鸿章，“久忧不死，何苦也”！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，变法的一页。



72. 抓军权：“以昆明易勃海”

梁启超在《瓜分危言》一文中，谈到了慈禧修颐和园。

梁在文中这样写道：“吾尝游颐和园，见其门栅内外皆大张海军衙门告示。同游之人，皆窃窃焉惊讶之，谓此内务府所管，与海军何与？而岂知其为经费所从出也。”

自从朝廷严惩吴御史后，再也没人跳出来反对慈禧修园子了。

老太太也就不再藏着掖着不敢示人，恰恰相反，她还要广而告之。

用海军的军费来修园子，世上竟有如此高招，它是怎样炮制出来的？

雷颐曾在《经济观察报》发表《太后修园之名与实》，文中说道，慈禧性喜享乐，几次想重修圆明园，终因花费太巨，被恭亲王奕訢、醇亲王奕譞以及李鸿章等人联手阻止。

后来，奕訢失势，奕譞日渐得宠，想找个理由为慈禧修园子，曾在昆明湖边设机器局为名，重修原建于乾隆年间与圆明园一同被焚的清漪园，还是为人所阻，未能实现。

此后，奕譞一直惦记着为太后修园子，耿耿此心，将近十年。

光绪帝亲政时，慈禧借口即将还政，重提修园子，以“颐养天年”。

时为海军衙门总理大臣的奕譞，奉慈禧之命巡阅北洋海防，忽生一念，终于找到了为慈禧修园子的名分，赶忙奏请《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》，原来，此法古已有之，拿来就是。

西汉时，滇池有昆明国，汉武伐之，先于长安掘一湖，操练水军，曰“昆明池”。乾隆以庆母寿和练水师为名，据汉武典故，扩建京城西北瓮山泊为“昆明湖”，于湖内设战船，仿福建、广东巡洋之制，由闽浙派员教演，按期水操，训练西山健锐营及外火器营弁兵。

故奕譞奏称：“查健锐营、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，后经裁撤。相应请旨仍复旧制。改隶神机营，海军衙门会同经理。”此折一上，慈禧顿时“依议”，难得总理大臣奕譞在名分上如此有根有据，会办大臣李鸿章也只好“依议”。

《翁同龢日记》言：“海军衙门会神机营奏，在昆明湖试小轮船，复乾隆水师之旧。”就这样，成立才一年的海军衙门，恢复了昆明湖“水操”旧制，名为“水操”，实则修园，大张旗鼓，设水师学堂于昆明湖。水师学堂，分水操内、外学堂。皇上和太后来观“水操”，设施岂能简陋？

奕譞又奏：“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圯，若不稍加修葺，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”，故“拟将万寿山及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、牌楼酌加保护修补，以供临幸”。

所需经费，自然要从海军出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十月二十四日，《翁同龢日记》云：“庆邸（奕劻）晤朴庵（奕譞），深谈时局，嘱其转告吾辈，当谅其苦衷。盖以昆明易渤海，万寿山换溱阳也。”“昆明”，即昆明湖，乃宫廷所辖，王权由来，“渤海”，即渤海，为北洋水师所在。以“昆明易渤海”，“易”非交易，而是“变易”，要把昆明湖变成渤海湾，要把北洋水师——李鸿章的子弟兵变成太后御林军。同时，向皇帝表明，她还政，只交政权，不交军权。为了显示对军队的权威，她动用了海军军费，以修园子插手海军，以调控军费来确保她对海军的支配。因此，修颐和园，看似告老宣言，实则要抓军权。

军队没有国家化，军权要想方设法去抓。皇上对于军队的所有权和统帅权虽为国家名分，但实权还得去抓，不抓，就有名无实了。没人教光绪帝去抓军权，没人告诉他名实之辨，没人劝他新政伊始便要自练新军，更没有人告诉他军队可以国家化，所以他的新政被抓军权的老太太颠覆了。

“昆明易渤海”，只是一个象征，离真正控制一支军队还差得很远。再说老太太也不是能带兵的人，她如此这般的意淫，并非要跟李鸿章争实权，而是要跟皇上争名分。她可以不听政，但皇上得去顾

问，她可以不理财，但皇上要作安排。因为皇帝由她选，也为她所立，于是皇上发话了：“此举为皇帝孝养所关，深宫未忍过拂，况工用所需，悉出节省羡余，未动司农正款，亦属无伤国计。”

这话说得还算漂亮。可怜太后，曾随先皇逃亡，逃到避暑山庄。如今她要颐养，以“万寿山换溱阳”（溱阳，指滦河以北避暑山庄），终于有了中兴气象。可劫后之地，如何颐，怎么养？眼看那些老地方遍体鳞伤，抚今追昔，难免悲伤。修一修园子，告别国耻；练一练水师，告慰先皇。就此而言，她怎么花钱，都无可厚非。问题是，其志非“颐和”，而是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”，依然要司晨。本来“司”到顾问份儿上，问到为止也就罢了，可顾问又岂是那么好问的？有顾问在，你不顾问那不行，你顾问了她也说了，你若不听她指示就更不行。这就是王权退休的成本，不光是修园子颐养的利益成本，更是体制上被分割的权力成本，尤其用海军军费修园子，不光动了李鸿章的奶酪，还动了皇上的命根。

其后果，如众所知，抽走海军军费，搞垮了李鸿章的海军，这也就抑制了正在兴起的北洋“军事—工业复合体”亚政权，同时，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于中日甲午战争。从此，李鸿章失势，由太后亲信荣禄取而代之，重练新军，她终于掌握军权，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，后来她就用这支军队发动政变，搞垮了光绪皇帝的新政。试问，如果李鸿章执掌直隶，她能用北洋水师发动政变？

从1886年到1894年，一直在修园，究竟花了多少钱？王道成《圆明园与海军衙门》根据档案记载，有一个大致的估算，他以乾隆修建清漪园为例，历时十五年，共用银四百四十万二千八百五十一两九钱五分三厘。颐和园仅修复了清漪园的前山、前湖部分，历时八年。颐和园的修建经费，虽然没有像清漪园那样的完整的记录，但是，根据样式雷家藏资料，颐和园五十六项工程，共用银三百一十六万六千六百九十九两八钱三分三厘。这五十六项工程，占颐和园工程的一半以上。由此推算，颐和园的修建经费当在五百至六百万两之间。过去流传的二千万两、三千万两、五千万两、六千万两、八千万两诸说，都是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的。我们认为，其实这是两笔款，

一笔是工程款，或如王所言，约在五六百万两之间，另一笔是占用海军军费的祝寿款，或在二千万两以上，如此插手海军军费，如果曾国藩在，她敢？

只要在渤海湾搞那么一个小动作，一个比“刺马”小得多的动作，例如，借口海军军费问题搞一次小小的哗变，只要海军在沿海一带放一两炮，稍稍刺激一下朝廷的神经末梢，就没人敢过问了。可李鸿章的表现很窝囊，他不敢用“诚”，而是自欺欺人，用“瞒”和“骗”为朝廷做糊裱匠，本来内里已百孔千疮，外表却被他糊得溜光，本来是一头笨驴，他偏要糊裱成老虎模样，让自己骑虎难下，不得不在这纸老虎来打，也亏了他的糊裱功夫，以至于直到甲午海战前，中外舆论几乎一致认定他会赢。总之，他没有守住老师教给他的那个“诚”，也许他的修身功夫还不够过硬，有“心中贼”被朝廷捉住了。

太后懿旨：办理六旬庆典，一切从简，内外臣工例贡免进献。特颁内帑赈顺、直灾区，嗣后着每年发银二万两，普给贫民。老太太花甲万寿莅临，先表个态以体恤臣民，表示以民为本，臣民感恩戴德，自然肝脑涂地以相报。先是醇亲王奕譞挪用海军军费祝寿，究竟挪用了多少，有多少被他借机中饱私囊，那是没法估计的，接着便是举国上下为祝寿募捐，究竟要多少银子，才能博老太太一笑？从一千万两到三千万两，这一估计不算太离谱。唐德刚的《晚清七十年》算了一笔账：此时，老太太私房钱约有纹银二万万两，她一天的生活费要花国库纹银四万两，一年总计也要花掉国库纹银一千万两以上。

就在祝寿工程铺天盖地，近朱者都在盘算如何分一杯羹时，小日本却在盘算中国。日本明治皇后为购买军舰“吉野”，将自己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，与老太太的自私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为了孝敬老太太，疲惫的帝国强打起劲头来祝寿，刚好《盛世危言》问世，以一个“危”字为寿喜破了题。

73. 皇榻之下“去李鸿章化”

康有为来京城应试，一到京城，就给即将亲政的光绪帝上书，说：

“日伺吉林于东，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，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，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。”

好像皇帝接的不是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兴的盘子，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。大喜临门时，他那张乌鸦嘴，竟发出不祥之音，长吟一句“治安一策知难上，只是江湖心未灰”，便拂袖而去。

尤其“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”一句，道出了铁路对于国防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。

其先，准将刘铭传入觐，亦曾有疏言：“俄日为中国心腹之忧。俄地横亘东西北，与中国接壤，自欧洲起造铁路，渐近浩罕，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琿春，以铁路未成，故引而不发，不出十年，祸且不测。日本一弹丸国耳，师西人之长技，恃有铁路，亦遇事与我为难。不修铁路，自强恐无及矣。”

又言：“自强之道，练兵造器，固宜次第举行，然其关键所在，则在于急造铁路。”

故极言“铁路之利”，“于漕务、赈务、商务、矿务、厘捐、行旅者”，都有说不尽的好处，“于用兵尤不可缓”，因为“中国幅员辽阔”，国防是个大问题，“北边绵亘万里，毗连俄界”，不仅要考虑陆防，而且“通商各海口，又与各国共之”，更要考虑海防。如不修铁路，则难言国防。

“画疆而守”，而无铁路连通，如此国防，可谓“防不胜防”。中国十八省，兵非不多，饷非不足，然此疆彼界，各具一心，遇有兵端，自顾不暇，征饷调兵，疲于奔命，国越大而国防越差，兵越多而越用不上。若铁路一开，各地贯通，将士赴命，朝发夕至，“视敌所趋，相机策应，虽万里之遥，数日可至，百万之众，一呼而集”，“驻

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，十八省合为一气，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”，故“裁兵节饷，反成劲旅”，边防海防，由国家全面部署，中央统一调度，“将来兵权饷权，俱在朝廷，内重外轻，不为疆臣所牵制”。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，可“军队国家化”五个字却说不出。

以为修铁路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防问题，那真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。修铁路是“车同轨”，搞中央集权少不了“车同轨”，“车同轨”虽然有助于国防，但毕竟不等于国防，专注于国防的物质层面，而忽略其制度方面，是晚清富国强兵运动的一个特点，以国防来说事，只说到物质层面，既可以回避制度问题，又能大把大把地花钱，真不愧为一代名将，能把修铁路说到国家安全和中央集权的高度上。可修铁路毕竟要花钱，不是花一点钱一些钱，而是要花很多很多的钱，“方今国计绌于边防，民生困于厘卡”，钱从哪里来？这就更要修铁路，而不能去买军舰了，唯有修铁路，能以路养路，以路养兵。

这也就无怪乎李鸿章要放下海军来修铁路了。明明是老太太把海军军费拿去修园子和祝寿了，可他偏要说修铁路比建海军更重要——“裕国便民，无逾于此”。话说得多漂亮！真是个治国平天下的糊裱匠，以为糊得严实，裱得漂亮，就国泰民安了。以铁路枢纽国防，不过解决国防的后勤问题，可真正国家意义上的国防，首先要在制度上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。只要军队国家化问题没解决，就会有人去抓军权。或拥兵自居，作为称霸一方的敲门砖；或觊觎王权，伺机发动政变。如果军队国家化了，老太太凭什么去抓军权？凭什么发动政变？甲午战败和戊戌变法失败一样，其根源都在于军队没有国家化。

我们看中国历史，发现，所谓“盛世”，就是名副其实的君主专制，其标志之一，便是朝廷上下很少出现“抓军权”的事。有人要抓军权，那一定是“名分”出了问题，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”，名分靠不住了，就用军队来执行，搞行政，没有军权可不行。你看那洋务运动中人，有哪一个不办兵工厂不建军校不练新军？就连清流出身的张之洞，不也投入到“军事—工业复合体”的建设中来了？而这样的“军事—工业复合体”，不正是建构新政权的原型？甲午战败后，北洋水师解体，老太太派荣禄执掌直隶练北洋新军，从“以昆明易渤海”到练北洋新军，老太太终于亲手抓了一支军队。

太后抓军权，果如赵烈文预言，“抽心一烂，从中央开始”。对此，曾国藩似乎也有预感，他见过老太太多次，并无所谓好感，他曾说过，如果皇上有难，他可以把皇上接来江南。赵以为行不通，因为清初开国，在江南杀戮太重。历史没有假设，但我们不妨假设一下，假如戊戌政变发生时，曾氏还在，他真的会将皇上接去江南？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，那就是，他在就不会有政变。退一步说，假如李鸿章的海军还在，太后能用这支海军搞政变？正是李鸿章及其海军都垮了，她才能自练一军搞政变。

老太太抓军权，“去李鸿章化”是关键，要在北洋“去李鸿章化”，首先就要掏空北洋水师。因此，她修园子、办寿庆，折腾了八九年，一直折腾到中日甲午战争前，折腾得北洋水师不进则退，落在了小日本的后面，整整八九年，李鸿章没钱建海军，军费决定军权，他只好去修铁路。

可铁路修得怎样呢？就在太后归政皇帝亲政那一年，粤商陈承德，请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，以“现造铁路，其所入不敷养路之用。如接造此路，既可抽还造路借本，并可报效海军经费”来说服李鸿章。此议一出，举朝骇然，尚书翁同龢，学士徐会沅，御史余联沅、洪良品、屠仁守等交章谏阻，其理由，大抵有三，不外资敌、扰民、失业。李鸿章对此，以“岂有资敌之虑？可无扰民之事，更鲜失业之虞”，一一加以驳斥后，专门强调了“津通之路”的国防价值：“非为富国，亦非利商，外助海军相辅之需，内备征兵入卫之用”，而且一再声明：“臣等创修铁路本意，不在效外洋之到处皆设，而专主利于用兵”，此外，对于“海防河运，裨益实多”，于“通货物、销矿产、利行旅、便工役、速邮递”等，“利之所兴，难以枚举”，因“事属创办，不厌求详”，故建议“请下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，各抒所见”。

粤督张之洞上疏，先以外贸言，以为“今日铁路之用，以开通土货为急”。他算了一笔账：“进口外货，岁逾出口土货二千万两”，这样下去，以后万不可支，唯有多销土货以济之，可没有铁路，内地物产，难以出口。次以国防言，以为“沿江沿海、辽东三省、秦陇沿边，强邻窥伺，防不胜防”，若无铁路应援赴敌，国防就成了大问题，所以，必修铁路。但津通铁路，以其至为重要，故不宜先修。而“翁

同龢请试行于边地以便运兵，徐会沅等请改设于德州、济宁以便运漕”也不合适，因为“边地偏远，无裨全局，效亦难见，且非商贾辐辏之所，铁路费无所出，不足以自存”，徐会沅等言“德济一路”，由于“黄河岸阔沙松，工费太巨”亦不宜，他主张“宜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，经河南达于湖北汉口镇”。

豫、鄂居天下之腹，为中原枢纽，于此地修一干路，可控八九省冲要，将来汴洛、荆襄、济东、淮泗四通八达，人货辐辏，贸易必旺，其收益，岂止养路？实可裕无穷之饷源。更何况，言中国矿利，无非煤铁，煤铁最旺，多在太行以北，铁路一通，可“大开三晋之利源，永塞中华之漏卮”。再说，近畿有事，电檄一传，不过二日，三楚两淮之兵便齐集都下，征兵之事，莫便于此。若沿海有战事起，漕运易被劫持，那时，就可以卢汉线代替，东南漕米百余万石，便可经由镇江，以轮船溯江而上，抵汉口，转卢汉线，达卢沟桥，由卢沟桥运赴京仓，路程与通县相等，以此可备河海之患，以防不测之事。

若虑费钜难成，则不妨分段建设，以“北京至正定为首段，次至黄河北岸，又次至信阳州为二三段，次至汉口为末段”，张之洞以“每里不过五六千金”计，预算每段铁路约需资金四百万左右，“合计四段之工，须八年造成，款亦八年分筹”，以“中国之大，每年筹二百万之款，似尚不至无策”，而“筹款之法，除由铁路公司照常招股外，应酌择各省口岸较盛、盐课较旺之地，由藩运两司、关道转发印票股单，设法劝集”，所谓“印票股单”，犹如今日股票、债券之类的东西，此因未有国家银行，而不得不由政府出面，搞社会集资。民间虽有钱庄、票号，但亦无力承受如此长期的建设资金，所以，尽管说了“藏富在民”，可实际上还得官办，自从胡雪岩倒了，朝廷再也找不到能承办大事业的商人了。

张之洞奏上，下海军衙门复议，议曰：各国兴办铁路，以干路为经，以枝路为纬，有事则以路征兵，无事则以商养路。津通，畿东南一正干也，水路受沿海七省之委输，陆路通关东三省之命脉；豫鄂则畿西南一正干也，控荆襄，达关陇，以一道扼七八省之冲。初意，先以津沽便海防，继以津通扩商利，今采纳张之洞建议，以事关创始，当择善而从，故缓办津通，先办卢汉，改以汉口至信阳为首段，由南

而北，于卢沟、汉口分投试办，预算约三千万两，于商股、官帑外，另举洋债，诏允之。

终于有了“诏允”，李鸿章立即书一函给张之洞书，请他宜速开办，免生枝节。然其心情，难免复杂，何以他要修路，便群起反对，受到打压，而张之洞调停其间，就大受欢迎？十几年来，他一直主张修铁路，几乎每一次提议，都是反对者众，而支持者寡，唯独这一次，从上到下都有人支持他，可他的风头还是被人抢了。对于张之洞修卢汉路一说，他在公开场合，不便反对，唯有支持，私下里则不以为然，卢汉路长达三千里，费银约三千万两，修起来谈何容易！所以，他说张之洞“大言无实”，最后“恐难交卷，终要泻底”。

未几，俄加速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，朝廷以东三省边事亟，听取李鸿章建议，命移卢汉路款先办关东铁路，拟由古冶林西造干路，出山海关至沈阳达吉林，另由沈阳造枝路以至牛庄、营口，计二千三百二十三里，年拨银二百万两为关东造路专款，命李鸿章为督办大臣，卢汉路工因之延缓。

可关东铁路的命运又如何呢？1891年6月，李鸿章设北洋官铁路局，始修关东铁路，才两年功夫，户部就以给太后祝寿的名义，向海军衙门“商借”关东铁路经费二百万两，把筑路专款都拿走了，还修什么铁路？1894年，津唐铁路已延伸至关外，他在关内关外，共修了约四百里的关东铁路就这样停建了。这年8月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日军打进来，连储存在旅顺材料厂的六千吨钢轨都拿走了。

朝廷这么做，究竟要干吗？无他，铁了心要在北洋“去李鸿章化”。北洋是朝廷的“卧榻”，卧榻之下，岂容他人将地盘驻扎？李鸿章啊李鸿章，你何不改姓为“让”？来要海军经费，你让，让了海军去修铁路，来要铁路经费，你还是让，一让再让，岂不窝囊？如此窝囊，你怎么能打胜仗！何如曾氏了结“刺马”，或学丁宝桢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将慈禧的宝贝太监斩杀，要么你就等着“去李鸿章化”……

74. 以上海为起点画一个圈

历史上，所有朝廷都反对一官独大，喜欢搞分化，分而治之。

有人说，民主制不也搞“三权分立”？不也在“分”上做文章吗？

但“分”有彼此，此“分”，乃王权主义的“分”，不光瓜分民权，还要限制官权，而李鸿章其人，尤须限制，其北洋系，已俨然成一“军事—工业复合体”，具有亚政权性质。

把“军事—工业复合体”，搁在官僚体制里，怎么看都不宜。这工业文明的尤物，同朝廷似乎总有点格格不入，不错，朝廷不得不靠它来支撑，可朝廷依靠它时，总是有如芒刺。

李鸿章身上，就有着这样的芒刺，他在官僚体制里，有意无意地扩张工业文明的芒刺，向朝廷喋喋不休地展示其“军事—工业复合体”的牙齿，他成了朝廷的肉中刺而不自知。

除了他部下，朝廷上下都想“去李鸿章化”。可撼山易，撼李难，何出此言？只因有他，多少还能代表国家。清无国防，惟其“军事—工业复合体”，看上去，还有点国防模样，如荷兰东印度公司，要船有船，要炮有炮，要工业有工业，要军校有军校，要外交有外交，要外贸有外贸……李鸿章对于近代化的贡献，就在于他的北洋“军事—工业复合体”，形成了国防体系和国民经济一体化模式。

以此模式，若无毁于甲午战争，它能否超越晚清，成为共和国体的原型？有可能。但我们还是觉得它缺了点什么，究竟缺了什么？也许缺了一种思想。什么思想？一种关于枪杆子的思想，不是拿起枪杆子的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思想，而是放下枪杆子的“军队国家化”思想。也许还缺一点力量，什么力量？不是关于民的被道德驱动的革命化力量，而是关于人的被欲望驱使的制度化力量。

欲望，一度被曾国藩当做“心中贼”而被捉拿，后来，曾氏从思想上受了王船山启发，懂得天理就是人欲，是人欲的制度化依据，而

论功行赏，便是将人欲在制度里坐实。李鸿章没有灭过“心中贼”，无须以天理即人欲来解放思想，天理人欲，在他那里，原本就是一团混沌未开的“痞子腔”。

“痞子腔”，便是以人欲立言，其好处，在以人欲做实事，其不足在用术。以修铁路而论，张之洞以清流之姿，挟朝廷扶持之力，抢了他的风头，他便跟张之洞打“痞子腔”，让张栽了跟头。

为修卢汉路，之洞移鄂，欲展宏图，令他不快。因卢汉路跨直隶湖广两地，分南北两段开工，之洞请他出马，北段从卢沟桥到正定府，由他问责，南段从汉口到信阳，张自领衔。张还想开矿、办厂、炼铁、炼钢，当然还要练新军，在中原腹地，再造一个湖广“军事—工业复合体”。本为同道，却非同党，理应道高于党，可他反而打“痞子腔”，一面“自愧年衰力薄”，自称“难睹其成”，私下又说张言过了，“恐难交卷，终要泻底”。然而，张未“泻底”，他来抽薪了，以俄修东方铁路覬觎关外为由，将卢汉路专款抽走，去修关东路，结果呢，此款经他手，又转去给老太太祝寿，关东路亦因此而未修成。怪不得慈禧寿诞之日，要破格赏他“三眼花翎”，连以“奴才”自居的满大人才有的待遇，他都享受了。

这究竟是受宠，还是受辱？在我们看来，这“宠”和“辱”都是一回事，亏他还能宠辱不惊。左宗棠死了，左氏集团也垮了，朝廷不能眼看他一股独大，若没人制衡他，制度就会垮，可谁来制衡他？朝廷有了新的安排，左宗棠倒下了，张之洞站起来，朝廷扶上马，送一程，把个清流后生张之洞，当做左的接班人来培养了。不知有意无意，左死后，朝廷谥以文襄，后来，张去世，亦被谥以文襄。曾、左、李的地盘，都是自己打下来的，任其发展，朝廷如坐针毡，总有不妥。而张的势力，是朝廷培养起来的，其根基，在上不在下，当然会听朝廷的话，如根基在下，似曾、左、李，就难免要下克上了。

要牵制李，把张放到哪儿去？放在两广太远，够不着，放在两江太近，那不是互相牵制，而是相互拼刺刀呢，这对朝廷也不利。从地缘政治上来讲，最好搁在湖广。湖广在长江中游，两江在长江中下游，顺流而下，便以上海为门户，江宁为玄关了。坐在湖广，不仅可

以长江为纽带，拽住李“条条”的尾巴，还能脚踏两湖，看守着湘军的老家，当年朝廷安排官文在此牵制曾氏，等于是扣压了湘军家属作人质，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。从两江反观湖广，则以湖广为内地，有了轮船招商局，便利了李的势力沿长江而登堂入室，将内地煤、铁输入两江，去发展李的“军事—工业复合体”，使上海不仅与天津还与武汉连成一体。

朝廷有朝廷的安排，李亦自有打算，朝廷想在李身后，再造一个官办而非官督商办的“军事—工业复合体”，来制衡李的战略布局。李一念初起时，虽反感，但，稍思，便知其为机遇，为他的“军事—工业复合体”，从沿海向内地发展提供了机遇。朝廷知其一，只知再造一新兴势力来制衡李，而不知新兴势力的崛起，反而要靠李来支持。也就是说，在武汉造一个“军事—工业复合体”，需要上海为它提供人才、资金、技术以及企业运营和进出口贸易方面的支持，而支持的过程，便是上海模式向内地发展的过程，同时也是李的“首长所有制”和“首长发展战略”向内地深化的过程。张也知道，他修卢汉铁路离不开李，所以坚持南段归他，北段归李，而造一个“军事—工业复合体”，就更需要李支持。

因此，两人先要相生，然后，才谈得上相克。所谓“相生”，实为双赢。以修卢汉路言之，张本以局外人进言，被朝廷采纳，成了赢家。李退而求其次，放下“清通路”初议，来修卢汉路北段，看似不得已，实则欲以卢汉路由北而南，以火车贯通两河流域，以轮船连江海为一体，入其彀中矣。

观其始议“清通路”，用意太露骨，不仅招来反对修铁路，即便主张修铁路的，也多半反对修“清通路”，因为修“清通路”明显是在发展淮军地盘，“清”指清江，即今之淮安，“通”指通州，把清江与通州连起来，如此海、陆并行，两手抓，这也太“李合肥”了！所以，朝议大都倾向于修从卢沟桥到武汉的铁路。而李来搞卢汉路，从表面上来看是由于清通路受阻，实际上，其欲以卢汉路拓展战略部署，这就等于他在规划中原，以江运、海运和铁路画了一个圈，将直隶、湖广、两江都圈起来了。